

道家与 中国哲学

宋代卷

孙以楷 主编

李仁群 程梅花 夏当英 著

人民出版社

B2

S9701

中国哲学

宋代卷

孙以楷 主编

李仁群 程梅花 夏当英 著

人民出版社

00105/01



责任编辑:张振明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家与中国哲学(宋代卷)/李仁群 程梅花 夏当英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

ISBN 7-01-004123-7

I. 道… II. ①李…②程…③夏… III. 道家-哲学思想-
中国-宋代 IV. B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3410 号

道家与中国哲学(宋代卷)

DAOJIA YU ZHONGGUO ZHIXUE

孙以楷 主编

李仁群 程梅花 夏当英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3.25

字数:271 千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4123-7 定价:2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 引论：宋代社会、哲学与道家道教 / 1
- 第一章 道家与两宋道教哲学 / 22
- 第一节 张伯端的道教哲学思想 / 24
- 第二节 陈景元注《老》及对老子思想之发挥 / 40
- 第三节 白玉蟾的宇宙论及其融合儒、释、道的实践 / 56
- 第四节 早期全真道以道为本的三教合一论及心性思想 / 70
- 第二章 道家与宋代佛教哲学 / 86
- 第一节 宋代天台宗与道家之关系 / 87
- 第二节 宋代禅宗(临济禅)的以道说佛 / 106
- 第三章 道家与宋初儒学 / 119
- 第一节 宋初辟老思潮 / 121
- 第二节 宋初诸儒的元气自然论与道家宇宙论的比较 / 134
- 第三节 李觏与老子 / 145
- 第四章 道家思想在理学中的体现 / 160
- 第一节 周敦颐与道家道教 / 160

- 第二节 邵雍与道家道教 / 176
- 第三节 张载与道家道教 / 194
- 第四节 二程与道家道教 / 212
- 第五节 朱熹与道家道教 / 233
- 第六节 黄震对老庄思想的批判及其沟通 / 249
- 第五章 道家与心学 / 253**
- 第一节 张栻与道家 / 253
- 第二节 陆九渊与道家道教 / 256
- 第六章 道家与实学 / 278**
- 第一节 陈亮的实学思想与道家的道术思想 / 278
- 第二节 叶适对老庄的批判及其与老庄思想的沟通 / 283
- 第七章 新学与道家 / 291**
- 第一节 王安石与道家 / 292
- 第二节 吕惠卿、王秀、龚原与道家 / 321
- 第八章 苏氏蜀学与道家 / 338**
- 第一节 苏氏蜀学概述 / 339
- 第二节 苏轼与道家 / 353
- 第三节 苏辙与儒、道、佛 / 376
- 第九章 婺学与道家 / 395**
- 第一节 吕祖谦的生平与基本思想 / 395
- 第二节 道家与婺学 / 403
- 主要参考文献 / 413

引 论：

宋代社会、哲学与道家道教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宋代，在哲学、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社会世俗生活领域都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势必使得在中国流行千年的道家思想文化形成新的发展趋向。也就是说，道家哲学（包括道教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在老子思想奠定的哲学思辨、人生关怀和修身养性之道这三个逻辑结构的基础之上，以心性性命之学为中心继续向前推展。道家与各派学说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在儒释道依然各自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更为强烈的融合互动趋向，儒家更在融摄整合释道的进程中构建了自然本体、天理心性与政治伦理统一的完整体系。

一、宋代政治与社会生活

赵宋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以来长期混乱的局面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王朝的建立，面临着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结束霸权相争的社会不稳定局面，确保中央皇权对中国全部领土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从宋太祖开始，在使用武力征服各路军阀割据势力之后，便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强硬

与安抚相结合,解除了武官的军权,防止了武人干政的威胁。为了进一步巩固皇权专制,太祖、太宗两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政权、财权、军权逐步由地方集中于中央,由中央集中于皇帝,这些措施有效遏止了秦汉以来反复出现的宗室、宦官、权臣当权和争权之乱。整个宋朝,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均未能形成威胁皇权的力量,这种情况表明,中央集权制度到宋代已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也预示由秦汉奠定起来的中国古代社会政体更加成熟。这种成熟的政治体制为宋代稳定的社会局面和思想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在某种意义上,北宋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为稳定社会、厉行中央集权统治创造了条件。由于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争造成了社会经济、政治、教育与思想的严重破坏,赵宋王朝采取了“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仿效汉初文景之治时期黄老思想对整治社会的指导作用,期望尽快改变民生凋敝的社会现象。宋太祖就以一种“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王夫之:《宋论》卷1,中华书局1969年版。下引同此)的戒惧之心,实施德刑并用,恩威并济,简政缓事,稳定统治的无为政治。宋太宗则遵循太祖奠定的规章制度,没有作太多的变化,依然信奉清静无为的政策。史载太宗对《老子》一书极感兴趣,认为“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之道,并在其内。”(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下引同此版本)并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淳化四年闰十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同此)宋真宗初年在“太祖太宗丕变衰俗,崇尚

斯文”的情况下，继续实行黄老无为政治，其特点是“谨遵圣训，绍继前烈”；求“静”求“安”，“守道不易”（《宋朝事实类苑》卷3）。

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宋初在清静中求发展，对百姓实行赈贷，减省刑罚，澄清吏治，减轻徭役，提倡节俭，奖励生产，倡导文治等措施，基本上恢复了全国的统一，并使濒临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公私富庶，人不思乱”（《宋朝事实类苑》卷3）的局面，为中央集权政治的有效运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思想文化界，宋初黄老无为政治带来了俭朴、读书、忠节的良好社会风气，为学术繁荣创造了条件，更促使道家哲学在这一时期广为流传。当然，宋初对黄老无为政治的曲解对当时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在民族关系处理上，无为不争被曲解为妥协退让，苟且偷安；在政治上，尽管推行中央集权政治，不断强化中央皇权，但同时，因顺被歪曲成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反对变革，形成了沉闷、保守的政治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厉行中央集权，赵宋王朝在抑制武权的同时，又大力倡导选拔和晋升文官的制度。就在“兴文教，抑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正月戊辰条》，第149页），“以文化成天下”（赵与时：《宾退录》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这样一个右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控制之下，科举制在宋代达到了最完善的程度。相对于唐代科举制有了明显的改进和完善。例如，在宋初就确立了殿试制度，建立锁院、糊名、誊录制度，以严格考试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宋代还改革了唐代进士及第后须经过吏

部释褐试才能任官的制度,使考生一旦科场及第就直接授予官职。另外,宋代还采取措施对官僚贵族子弟登进士第作出限制,从而为寒门子弟开及第的方便之门。这样一些举措,大大提高了士子读经应试的热情,使宋代取士的人数也大大多于前代,为统治阶层充实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据统计,宋太祖朝共放 15 榜,录取正奏名进士 349 人,特奏名进士 106 人;太宗朝放 8 榜,录取正奏名进士 5829 人,特奏名进士 206 人;仁宗朝放 13 榜,录取正奏名进士 10207 人,特奏名进士 6387 人。^① 这与唐代每年仅录取进士三十人左右形成极大反差,这数以万计的进士充斥于宋政府的各级政府机构中,不但宋政府官员队伍的素质得以大大提高,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因之广为普及光大。

与科举制度改革相适应,宋时的学校教育也得到很大改善,大面积向社会下层开放,在唐代作为贵胄子弟专门学校的国子学和太学的入学资格,均有降低和放宽。唐代国子学为高级官僚子弟的混合学校,唐代太学是中级官僚子弟学校,下级官僚子弟尚被拒于太学门外,而宋代太学不仅招收下级官僚子弟,而且招收庶人子弟,甚至工商业者的子弟。在地方州县则普遍建立地方学校,普遍向社会各阶层人士开放。同时,私人讲学之风盛行,各类书院得到很大的发展,当时著名的书院就有嵩阳、应天、茅山、白鹿洞、岳麓、石鼓等,一般由著名学

① 据张希清《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表二《北宋贡举登科表》有关部分统计。转摘自宫云维:《宋初文化政策及儒佛道之关系》,《孔子研究》1997年第4期。

者如胡瑗、孙复、程颐、朱熹等讲学，并培养出大批有成就的弟子。师生之间可以相互讨论，互相辩难，一改过去拘泥于师说的古板学风，这对宋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宋代科举制度和学校教育的转变，是对当时社会阶层关系变化的直接反映，其积极意义是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繁荣，其直接后果是使一批出身寒门的优秀人才登上历史舞台，像范仲淹、李觏、欧阳修、王安石、张载、苏轼、朱熹等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作为社会新兴阶层，在宋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在政治领域励精图治、革新除弊，掀起社会改革的高潮；在思想领域，则促进了各派思想的共同繁荣。由他们开始，宋代学术界、思想界形成了汉唐从未有过的众多学派，中国历史一时间呈现出又一轮“百家争鸣”、“新旧杂陈”的繁荣景象。同时，各家均高举复兴儒学的旗帜，不同程度地排斥佛道学说；另一方面又或隐或显地吸纳佛道精粹思想，为儒学注入新鲜血液，并最终构建了纯哲学理论和完整的儒学体系，实现了真正的儒学独尊。

基于成熟的专制政体的确立，及社会上下层统治者为社会稳定和繁荣作出的共同努力，宋代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农业上，农产品尤其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且新兴种植技术不断传播。在农业兴盛的基础上，宋代工商业同样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了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高潮。小商巨贾的发达，新兴行业的出现，大批工商业重镇，如开封、金陵、杭州、泉州等城市的涌现，成为宋代社会繁荣的一个主要特征。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科学文化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宋代的科技

水平也超过唐代而达到新的高度,从而为宋代哲学包括道家哲学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

然而,太平盛世的景象背后,又孕育着中国历史上又一轮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社会进步在优化人们生存条件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社会不平衡。两宋时期农民的依附地位相对削弱,但新的土地兼并又使农民陷入深重灾难中,他们越来越感觉到社会两极在政治上的极端不平等和经济上的极端不平均。因此,主张“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北宋方腊)、“等贵贱,均贫富”(南宋钟相、杨么)的农民起义迭起,这为儒家的政治原则与伦理规范的构建与强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也促使佛道学说在内容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在外务上,宋王朝从建立初起,与边境少数民族的矛盾冲突就不断发生,其程度之激烈,规模之大,也是历史上空前的。在求安求稳的心态驱使下,两宋王朝对不断侵扰的民族采取了妥协的政策,屈辱求和,企图获得边境的暂时安宁,却进一步加剧了外族入侵,加重民众负担,造成财用匮乏,社会险象环生。

二、赵宋王朝与儒、释、道

宋代,中国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求新求变的突破时代,作为中国三大主要文化形态的儒、释、道三家学说,经过历史的演变和对现实社会的依附,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其间有斗争,也有融合,而三家学说的交融互动亦即三教合一构成了宋代文化发展的主流。这一主流的出现,是与宋代社会的需要及宋王朝文化政策的导向作用分不开的。

对于某种正在流行的学说,统治者一般都持严密的观望

态度,根据这种学说能否服务于现实统治,采取扶持引导或压抑贬低的政策,而儒、释、道三家各有其为统治服务的思想内容。宋代(主要是宋初)正处于中央集权统治加强和宗法伦理制度进一步完善的特定历史时期,发掘社会思潮中的有利因素显得尤为重要。于是在提倡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前提下,又对佛道两家思想进行了倡导,也即取一种三教共同尊奉的文化政策,从而奠定了宋王朝三教并尊的格局。

由孔子创立的儒学,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三位一体的学说,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适应我国传统宗法社会制度需要的伦理道德系统。经历两汉、魏晋、隋唐五代,无论哪一个王朝,千年的历史证明,儒学能够维护现实统治秩序的长久与稳定。儒家一直占据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宋代统治者对儒学的尊崇达到了新的高度,孔子地位进一步抬升。宋代诸帝曾多次祭祀孔子庙,孔子墓,宋真宗还封谥孔子为“元圣文宣王”,孔子后裔都得到了前无古人的优礼与厚待。赵匡胤登基伊始,即表现了对儒学的喜爱与提倡,他“即诏有司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六月》)。这对宋初儒学的复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促使朝廷官员中形成右文轻武的风气。以后历朝都以重视儒学教育、网罗儒臣为治政重要纲领。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曾受到全国普遍的崇拜,另外宋初诸儒如胡瑗、孙复、石介等人“以道义为本”,“人品既高冠于新碑之首”,因传播儒学而成“一时俊秀”。(袁燮:《絮斋集》卷10,《四明教授厅续壁记》,《四库全书》第11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社 1987 年版。下引《四库全书》均同此)。朱熹学说虽一度遭禁,但至南宋理宗时即被列为官学,实现了儒学真正的独尊地位。南宋光宗有言:“亲儒生、最有益。”(楼钥:《攻媿集》卷 96,《宝谟阁待制致仕特赠龙图阁学士忠肃彭公神道碑》,《四库全书》第 1153 册。下引同此),点出儒学与宋王朝统治者处理国家大事的直接关系。

宋代统治者在尊孔崇儒的同时,亦因为佛教的布施、持戒、忍辱、禅定、智慧,与道家的清静、慈俭、柔弱、无为、少私、寡欲,“足以助转化”,对佛道二家给予了扶持,有倡导儒、佛、道融合共佐朝政的政策。

宋初诸帝多崇信佛教。宋太祖曾经有敕雕《大藏经》的壮举,“诏成都造金银字佛经各一藏”,“诏雕佛经一藏。[注]计一十三万板”(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 18,《四库全书》第 1054 册),开中国佛教史上官刻汉文大藏经的先河。宋太宗也多次发表崇佛的言论,曾称:“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道群迷,阐扬宗性,广博宏辩,英雄莫能穷其旨;精微妙说,庸愚岂可度其源?义理幽玄,真空莫测也”(《佛祖历代通载》卷 18),对佛教学说的赞叹之情溢于言表。与太祖、太宗相比,宋真宗尤以崇道著称,但其“敬佛重法”亦甚于前朝。他曾撰写《崇释氏论》,宣称“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道同,大旨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窃则廉矣,不惑则疏矣,不妄则信矣,不醉则庄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5,《真宗咸平二年八月丙子》)将佛教与儒家并列,无形中抬高了佛教的地位。除了北宋徽宗时有一次大规模的排佛运动外,宋代其他皇帝都对佛教持尊奉的态度。

和儒佛一样，道家学派及学说在宋代也经历了复兴与发展的过程，这主要也得力于国家政权统一之后，宋时统治者对它的崇奉。道家（道教）文化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其柔弱退让、清静无为的学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人们的物质奢侈和政治野心。为了净化人心，稳定社会，粉饰太平，宋时统治者对道家道教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宋太祖、太宗在建国登基时，都曾有“号知天文”的道士苗训、张守真等为其制造谏语舆论，充分发挥了道教维护现实皇权的政治功能。宋太祖建国之后，除了在治国纲领中融合道家黄老无为思想外，对道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屡次下诏召见道士，询问治国养生之术，并派人搜访道经，敕建宫观。他见到战乱后道教式微，道团涣散的局面，恢复了对道教的统一管理，曾“集京师道士，试验其学业，未至而不修饰者皆斥之”（同上书，卷13，《开宝五年十月》），对道士进行甄审。宋太宗也看到“夫道者，天地万物之祖，而其教终微”（《太宗皇帝实录》卷30，上海涵芬楼影印本宋馆阁本），对道教予以更多的支持，他本人还结交道教著名人物。如陈抟、种放、丁少微、张守真、王怀隐、陈利用、赵自然、柴通玄等均与太宗有过交往，甚至被赐以道教“大师”之号。太宗也修建宫观，广搜道书，派人编写了宋时最早的《道藏》，为道家典籍的传播和保存作出了贡献。为了化人心，固王权，宋太宗还宣言宋王朝有天神保佑，大搞崇奉圣真和斋醮祭祀活动，还将道教的斋醮科仪纳入到皇朝的祭祀制度中。宋初对道教的倚重，奠定了宋统治者重“道”的格局。以后宋王朝越来越推崇道教，并出现了宋真宗、宋徽宗两名历史上著名的崇道皇帝，其崇道政策比宋初诸帝更为鲜明。两宋统治者崇

道除了出于“神道设教”的目的之外，也是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意识昂扬的情况下，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偏护。像宋真宗就认为道教“惟中原有之，然不甚盛”，因此必须提携它、崇奉它，“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觊之志”（《宋史》卷8，《真宗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下引《宋史》，同此）。

三、三教合流的思潮

两宋尤其是北宋统治者采取的三教并用的政策，对宋代思想学术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使思想家的思维取向为之发生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三教合流社会思潮的成熟。三教合流并非始于宋代，早在汉末三国时期，牟子、康僧会等就提出了“调和三教”的理论。牟子在著名的《理感论》中就认为三教“金玉不相伤，精魄不相妨”（《弘明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下引同此），在根本理念上并不冲突，一个人可以既学儒，又学佛道。康僧会也说过“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的话（《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下引《高僧传》同此）。以后历代都有人提倡儒佛道可以相通乃至可一的主张，著名的有东晋道士葛洪，隋唐名儒王通、柳宗元等。到了宋代，高唱三教合一已不是一两个人的一己主张，而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普遍的共识，并且突破了原先的泛泛而论，不再仅仅是将三教进行简单的比附、对照，而是进一步深入三教学理，全面而又有重点地将三教思想加以调和汇融。

宋代理学就是在儒学原有教义的基础上，又对佛道高度思辨的心性本体论、宇宙生成论等理论加以整合与创新的结果。像大儒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北宋五子在复兴

儒学的过程中,大多有着深刻地出入佛道的心路历程,并花费了大量心血去研究佛道,以便运用其宇宙论、本体论、修养工夫为儒家的纲常伦理、人性论做论证,利用其逻辑学、方法论提高儒学理论水平,使儒学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最终形成了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在新的理论基础之上,儒学从形式到内容更加完善,地位也更加显著和稳定。

佛教由于它特殊的外来文化的身份,从刚传入中国起,就对三教合一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宋时佛教虽仍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但相对唐朝时的地位有所下降,因而更加倡导三教合流,明确主张以儒家为中心,使佛教服从于儒家的调和思想。像智圆、契嵩等人均公开宣传宗法思想支配下的忠孝、仁义、五常等儒家伦理道德,鼓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对于地位最为薄弱的道教,佛教则少有言谈二者间的融合,表现出一定的媚俗倾向。但泛论三教,则基本上持三教圆融的态度,注意从理论上对三教加以会通,典型的观点是智圆的三教教药说。

宋代道教在政治文化的导向下,也进入了蓬勃发展期。这时道教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内丹论;一是三教合一思想。这两个特征密切相关,而三教合一思想是内丹论的基础,也是宋代道教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自从陈抟提倡道教融合儒释二教以来,道家人物一直强调三教互补互融。道士张守真曾假借天神之口,宣扬调和三教的理论。他讲他曾问翊圣保德真君:“道、释、儒典并重于世,未审崇奉何者即得获其福?”真君回答说:“《太上道德经》大无不包,细无不纳,修身炼行,治家治国,世人若悟其指归,达其妙用,……谅无所不至矣。释

氏之《四十二章经》，制心治性，去贪远祸，垂慈训诫，证以善恶，亦一贯穿于道矣。奉之求福，固亦无涯。至于周公、孔子，皆列仙品，而五经六籍，治世之法，治民之术尽在此矣。”（《翊圣保德真君传》卷中，《道藏》第32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下引《道藏》同此）从个人求福的角度议论、详述了三教不同的社会功能，无形中又包含了三教平等、缺一不可的三教合一思想。北宋著名道士张伯端正是在融合三教的前提下，初步完成了道教外丹术向内丹术的转变。他在《悟真篇》中说：“教虽分三，道乃归一。”（《悟真篇三注·悟真篇序》，《道藏》第2册）接受佛教禅宗心性论和儒家有关伦理、性命之说，糅三教为一体，主张性命双修、先命后性。以后的内丹派南、北宗均突出了三教合一的这一时代趋势，并影响了道教其他门派，使道家思想日渐深入人心，从而对三教合一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然，儒、释、道三教并不仅仅存在合流的倾向，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造成了三教之间存在长期的矛盾斗争，各派思想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与论争。像儒家学者尤其突出对佛道二家的排斥与批判。宋仁宗庆历之际，排斥佛道曾是整个学界所关心的一件大事，北宋诸儒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等均有大量排斥佛道二教为“异端邪说”的言论，其目的是为了排去阻碍儒学复兴的外在社会力量，以维护和完全确立儒家显赫的独尊地位。后来程朱等人也对佛道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朱熹说：“庄老绝灭义理，未尽至，佛则人伦灭尽，至禅则义理灭尽。”“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疲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释老称其有见，只是见得个空虚寂灭。真是虚，真是寂无处，不知他所谓见者见个甚